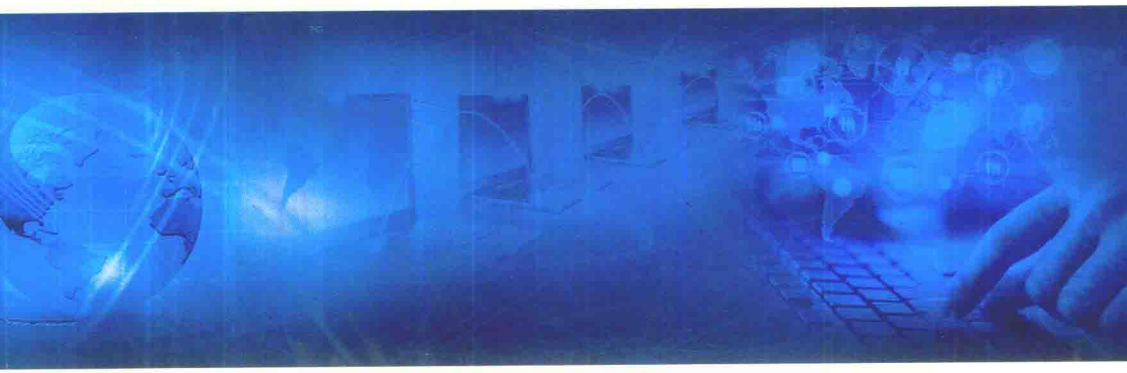
Study On Narrative Paradigm And Follow-up Governance Of Internet Rumors

网络谣言叙事范式及“跟进式”治理研究

浦玉忠　薛健飞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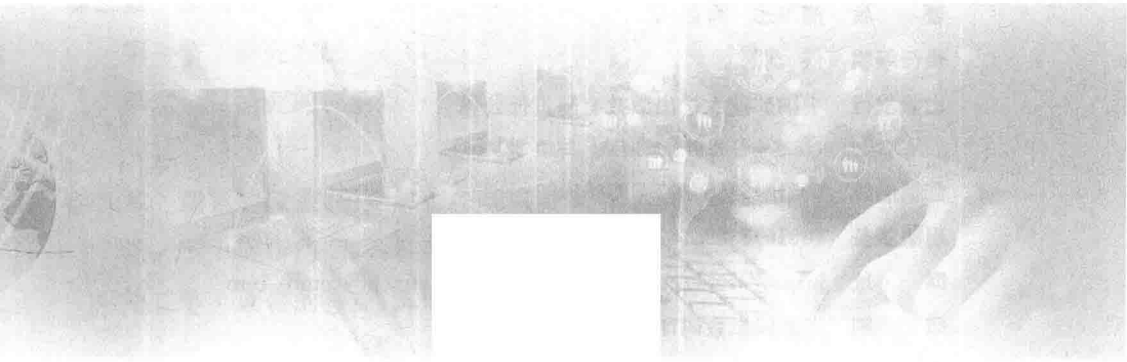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网络谣言叙事范式及网络文化安全体系构建研究”（16YJCZH130）资助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跟进式’引领大学生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7AKS023）资助
2017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谣言叙事中的网络道德失范问题研究”（17MLC004）资助

网络谣言叙事范式及“跟进式”治理研究

浦玉忠　薛健飞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谣言叙事范式及“跟进式”治理研究 / 浦玉忠，薛健飞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646-3729-3

Ⅰ.①网… Ⅱ.①浦… ②薛… Ⅲ.①互联网络—谣言—治理—研究—中国 Ⅳ.①D6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4386 号

书　　名　网络谣言叙事范式及“跟进式”治理研究

著　　者　浦玉忠　薛健飞

责任编辑　侯　明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0.5　**字数** 31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研究缘起

第一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运而生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牢牢扎根于中华传统国家安全的理论土壤，广泛汲取国外相关理论实践的有益精华，提出了一系列内涵外延丰富、时空域限宽广、系统全面可持续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最终萃取成一套逻辑严整、蕴含深刻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这些战略部署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凝练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宏观指引。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他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

导。”[①]同时，他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②]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涉及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以及海外利益等多个领域的安全。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安全建设提供了系统的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科学有效的战术路径及方式方法，既立足现实，又着眼未来，既传承创新，又昭示前景；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

五大要素，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是要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把制度安全、政权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为国家安全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就是要确保国家经济发展不受侵害，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物质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就是要注意这些领域面临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遵循不同领域的特点规律，建立完善强基固本、化险为夷的各项对策措施，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硬实力和软实力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就是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注重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注重维护共同安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五大要素凸显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逻辑联系。[③]

五对关系，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强调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强调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存在有机的统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强调传统

①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00.

②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00.

③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21.

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强调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面，只以其中一项为目标，两个目标均不可能实现；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强调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使得中国和世界的安全已密不可分。五对关系真实反映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辩证思维，以及互相联系、互促互进的哲学理念。①

综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结构布局，我们可以发现，网络安全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要素和非传统安全的新的领域，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第二节 网络安全观的应时而出

近年来，习近平同志深刻把握信息时代社会发展新特点、新规律，高度关注网络空间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产生的深刻影响，深入阐释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由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宏观思考、战略部署和政策主张，有综合统筹的总体安全观、网络强国的目标愿景观、一体两翼的双轮驱动观、携手应对的合作共赢观、交流互鉴的共享平台观、可管可控的网络清朗观、建章立制的依法治理观、安全保障的有序发展观、尊重互信的网络主权观、民主平等的总体安全观，概言之为十大“网络观”。这一系列理论揭示了互联网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动力源泉，创造性地将虚拟与现实、发展与安全、主权与开放、法治与治理、自由与秩序等哲学理念融合于网络安全发展实践之中，体现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结合的全域治理战略思维，突出了治理方式系统化、整体化、协同化的个性特征，破除了传统治理模式“九龙治水”、“一叶遮目”的弊端和不足。十大“网络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发轫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论述之中，也体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内政外交国防的丰富实践之上，更印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取得的

①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1-22.

累累硕果之中。

总体安全观的战略思路和发展图景也揭示并论述了网络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具有的渗透性、全域性和综合性的安全特征。在信息时代，网络安全之于国家总体安全观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具有“神经中枢”的功能和地位。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等方面都必须建基于网络化、信息化、数据化的基础之上，其所有的基础设施的核心要件都离不开网络信息系统。美国早在多年以前就将网络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列为国家宏观战略，从国家层面予以布局和推进，全面提升网络安全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最为知名的就是其开展的爱因斯坦计划。同时，美国政府还专门设立了组织架构完备、协调灵活有效的网络空间安全协调中心，专职开展重大网络设置的动态感知、监控、共享及应急管理。此外，当前政治领域的“颜色革命”、经济领域的网络诈骗、社会领域的人肉搜索、军事领域的信息化战争、科技领域的网络窃密，都是网络空间对传统领域安全问题的催化与变异。譬如，2010 年，“震网”病毒攻击了伊朗核设施。2014 年，乌俄冲突中，乌克兰通信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打击，成为信息“孤岛”。“8·19”电信诈骗案导致花季少女逝世……可以说，在信息社会，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可谓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对此，网络安全法也呼之欲出，涉及网络安全相关条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于 2015 年 8 月 29 日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发布，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同时，《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已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正式发布。这些理论论述及实践应用分别从虚拟与现实、法治与伦理、发展与安全等方面，全面凸显了网络安全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总之，网络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和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其发展战略已成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重要内容。2017 年 2 月 17 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强调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加强网络安全预警监测。

第三节 网络谣言治理的应势而谋

网络空间并非一方净土，更不是“法外之地”。当前，网络安全不仅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渗透战略（鼓噪“网络自由”、“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观”）、国内多元思潮（“新儒学”、“实用主义”）的潮来潮往等多方面挑战，还面临着各种网络谣言蛊惑民众、破坏和谐的叵测居心。北京“八达岭老虎咬人”谣言四起，侵犯受害者个人权益；罗尔诈捐事件谣言持续发酵，消解社会信任；雾霾谣言真假难辨，危害社会稳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重大事件之后，都会伴随着各种网络谣言的产生。这些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谣言轻则混淆视听、侵害隐私权益、危害身心健康、增加事件处理的难度，重则颠覆主流价值观，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震荡。具体而言：

网络谣言关系国家安全。网络谣言凭借网络虚拟社会的虚拟性、匿名性、开放性、即时性等特性，罔顾宪法法律、社会道德、公序良俗，大量散播谣言“潘多拉”恶果，致使网络谩骂、网络中伤大行其道；电信诈骗、黑客攻击肆意妄行；恶搞调侃、污蔑英雄等恶行信马由缰。在众多网络谣言中，又以关涉人身健康、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疫情、生态环保等类型居多，而涉及公益慈善等谣言，以其透支社会诚信、淡漠社会良知而危害最为深远。此外，网络谣言又依托其形式多样、变异多元、隐蔽性强、渗透性强、事后验证性等特点，紧紧地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威胁深度结合、相互激发，从而导致国家安全边界不断扩大，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联动性、多变性日益凸显和日趋严峻。

网络谣言关乎文化安全。鉴于兼具广播的速度与便捷，电视图文、声情并茂的有机结合，报纸、杂志报道的深度与详尽等特点，网络社会已成为思想领域的重要载体和前沿阵地。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及自身健康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网络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然会去占领。而反观现实，境外敌对势力将互联网当作向我国进行意

识形态渗透的工具，不断发布各种政治、军事、经济等网络谣言，企图解构并颠覆我国的党史、国史、民族史，力图将互联网打造为各种政治主张的“策源地”、参政议政的“新场所”、组织活动的“大本营”、推动“颜色革命”的“训练营”，中西方网络思想文化争夺日益加剧。

网络谣言关涉网络安全。从文本层面考量，网络谣言依靠“眼球经济”及网络交往技术的特点，特别是微博严格的140字内容限制，使得网络谣言中大量充斥着标题新奇、零碎芜杂、浅表简单、缺乏理性的信息，呈现出“碎片化”、“零散化”的特征，很难帮助网民形成对网络信息的逻辑把握及整体理解，再加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作用，导致网络谣言大量转发，形成裂变态势，导致大规模的网络恐慌。从心理层面分析，占主流地位的青年网民个性化心理特征较为明显，喜欢标新立异、张扬个性，网络社会个性化、多样化的使用、消费、娱乐等方式又进一步强化了青年的个性化追求，出现了“泛娱乐化”现象，进一步消解了传统权威的传播效果、威慑作用和规范作用，同时也导致青年网民依托网络谣言将人性中灰暗、丑陋的一面充分地显现出来。譬如，侵犯他人的隐私，大量使用网络语言暴力公然诽谤他人、中伤他人人格，传播虚假新闻等等，消解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些行为都对网络安全及现实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总之，维护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及网络安全，科学治理网络谣言亦如“打蛇打七寸”，“牵牛要牵牛鼻子”，是重要抓手，也是主要突破口。为此，如何针对网络谣言的难以辨别、变异多端、事后验证性等特点，科学辨别网络谣言的特征、逻辑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如何围绕特点，采取富有针对性的方法举措，构建协调发展、平衡有序的网络谣言治理体系，已成为当前极富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而从叙事学角度入手进行深入研究，或许会是把握本质、有效治理、创新内涵、建构体系的一个有益尝试。

第二章 研究现状及价值

本章将从国内国外两个空间维度出发，主要围绕谣言、网络谣言、叙事、网络谣言治理等方面展开文献综述，这些成果对本研究中的内涵界定、方法借鉴、理论嫁接、模式构建等方面极具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之后，从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两个方面，对本书的研究价值展开论述。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动态

（一）谣言研究

谣言研究层面主要集中在内涵、原因、治理等方面：一是内涵定义。刘建明提出谣言是“指众人无根之言的传播，又称谣诼、谣传，只有传播虚构事件的人鱼贯而动，达到舆论量，才成为谣言”（刘建明，2001）。胡珏认为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他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谣言公式，即“谣言＝（事件的）关注度×（事件的）模糊度×（事件的）反常度”（胡珏，2000）。二是原因分析。其原因包括：谣言是一种特殊的信息（陶长春，2014），政府缺乏预警机制，信息公开力度有待进一步扩大（吴丹丹，2014），民众缺乏科学知识（姜胜洪，2013）。三是治理方式。相关学者提出的治理方式有：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姜胜洪，2015），加大刑法治理力度（刘盾，2014），协同网络技术人员、监控人员以及各种媒体的共同努力（田惠凤，2012）。

（二）网络谣言研究

网络谣言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内涵定义。网络谣言是“在网络这一特定的环境下，网络使用实体以特定方式传播的，对网民感兴趣的事务、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巢乃鹏、黄娴，2004）。还有学者提出了突发事件网络谣言的改进型概念模型：$R=EI\times EA/(GA\times GO\times WS\times PJ)$，其中 R 为谣言，EI 为事件的重要性，EA 为事件的模糊性，GA 为政府公信力，GO 为政府信息透明度，WS 为网络监管能力，PJ 为公众的判断能力（杨小林，2014）。二是产生原因。其原因包括：政府监管和防范意识薄弱与滞后（高亮，2013），公民意识和科学知识欠缺（何云娜，2013），网络媒体自身存在缺陷（邢丹，2013），权力不平等状态下的社会抗议（靖鸣、王瑞等，2012）。三是特点特征。包括：发布门槛低（黎慈，2013），传播速度快（陈华明，2014），传播范围广（田惠凤，2012），传播路径多（李小光，2014）。四是具体类别。网络谣言根据传播平台分为微博谣言、论坛谣言、即时通讯系统谣言、微信谣言（陶长春，2014）；根据内容不同分为网络政治谣言、网络经济谣言、网络军事谣言、网络社会生活谣言和网络自然现象谣言（田惠凤，2011）；根据目的不同分为出于不法目的的有意谣言、为吸引眼球引人关注的谣言、为紧跟“潮流”无意中散布的谣言（靖鸣、王瑞，2012）；根据网络谣言兴起到现今的情况分为娱乐型、先入为主型、报复发泄型和利益争斗型（茹鲜古丽·吾普尔，2012）。五是治理措施。其措施主要包括：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白树亮，2010）；加强网络传播的监督管理（茹鲜古丽·吾普尔，2012）；提高公众的道德法律意识（许亚荃，2012）；破除“神话”，还原文字符号直接意指功能，理性批判，打破谣言逻辑链条（秦斯，2013）。

（三）叙事研究

叙事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功能、叙事伦理、伦理叙事等层面。一是叙事功能。叙事策略上具有构解功能、叙事方式上具有呈述功能、叙事结构上具有断续功能、叙事频率上具有预复功能、叙事语法上具有通变功能（周进芳，2003）。叙事不仅仅是讲“过去的事”，也不仅仅是传授过去之维中包含的真理和必然性，而且关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传承，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孔建平,2003)。二是叙事伦理。讲故事与听故事都是“伦理的感受”(刘慧、戢守玺,2004)。叙事伦理透析创作主体在伦理叙事时秉承的叙事姿态、文化立场、道德价值判断、艺术观念和美学风格等叙事意旨性因素(张文红,2006)。三是伦理叙事。伦理叙事既有上层和主流所标举提倡的,如忠孝节义之类;也有下层和民间看重的,如忠厚勤俭、助弱济贫之类(董乃斌、程蔷,2003)。而围绕网络谣言的叙事学研究在学界关注较少,值得借鉴的有网络文学的“比特叙事”(欧阳友权,2004),网络小说的叙事模式(黄玖胤,2004)。与本研究最为相关的是对网络谣言叙事主体、叙事动机、叙事方式进行的初步探讨(罗卫光,2015)。

(四) 网络安全研究

网络安全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面临形势。目前,网络安全研究所面临的形势包括:世界各国加速网络安全战略落地部署,网络空间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日趋凸显(何维保,2013),网络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孙佑海,2014),网络基础设施隐患重重(李力、王虹,2009),顶层统筹全面加强(李宏图,2014),我国网络安全工作立足新起点施展新作为(胡传平,2014)。二是举措方法。包括:建立法律保障体系(段德功、丁莹亮,2012),产学研用管(赵战生,2014),充分发挥认证认可的作用(魏军,2014),重视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尹丽波,2014),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建标准、共治秩序、共赢天下(徐云峰,2014),以及通过创新网络安全测评方法、构建网络安全风险指标体系、开展网络安全绩效考核(李建彬,2014)。

(五) “跟进式”理念的研究

“跟进式”理念源于经济领域商业活动理论和组织行为学“跟进”的方式和相关原理。2006 年有高校开始将这一理念运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之后该理念又在其他高校得到推广。十多年来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实践成果,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开始研究这一理念的相关理论及实践中的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跟进式教育”。部分学者认为“跟进式教育”的内涵是通过“跟进”的思维和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工作思想和策略(韩晓庆等,200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跟进式教育”之间表现

了抽象概念与具体实践之间的逻辑意蕴(李萍等,2009)。二是“跟进式”培育模式。部分学者认为应以“跟进式教育”为立足点,确立一套理念科学、体系完整、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方案(薛健飞等,2014;李萍等,2015)。三是“跟进式”引领模式。部分学者认为应秉承以人为本、交往实践的理论原则,构建五位一体的“跟进式”引领模式(石磊等,2015)。“跟进式”理念是在我国基层的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的,目前国外还没有相关的系统研究。

二、国外研究动态

谣言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内涵性质。《韦伯斯特英文大字典》指出:“谣言是一种缺乏真实根据,或未经证实、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Liz Kauffman,1989)。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认为“谣言是一种与时事相关,旨在使人相信,并在不能明确证实的情况下口头传播的陈述”,并提出了谣言公式 $R=I\times A$,指出谣言的传播广度随其对相关个体的重要性乘以该主体证据的含糊性的变化而变化(G. W. Allport, L. Postman,1947)。克罗斯对这一公式进行了完善,他认为 $R=I\times A/C$,其中 C 是“批判能力”。美国社会学家涩谷堡认为谣言是一种社会行为,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求一种合理的答案。谣言的内容在于集体讨论过程中的添油加醋与即兴创造(涩谷堡,1966)。“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谣言是一种反权利(诺艾尔·卡普费雷,2008)。二是原因分析。谣言能提供一种排解紧张情绪的口头宣泄途径;它们通常能为这些情绪的存在作辩解;能为周围环境中令人费解的现象提供更为广泛的解释(G. W. Allport, L. Postman,1947)。谣言是适应情境变化的一种手段,可以从对方那里获取某些回馈(R. L. 罗斯诺,G. A. 费思,1990);可以在传播过程中找到一些合适的对象(费朗索瓦斯·勒莫,1999)。三是歪曲方式。谣言可通过简化、强化、同化等心理手段实现(G. W. Allport, L. Postman,1947)。四是内蕴叙事因子。“谣言传播的信息存在二律背反,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将谣言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开:叙述(或报道的故

事)和论说(或围绕这则'新闻'作的评论),论说是保证叙述的社会存在"(费朗索瓦斯·勒莫,1999)。五是治理方式。要保证公众对官方媒体无条件信任;保证公众必须信任他们的领袖;尽快发布相关事件的信息;确保公众全部能接收到这些信息;通过工作或者业余生活安排,以避免人们过度清闲而传播小道消息(G. W. Allport, L. Postman, 1947)。

网络谣言的研究集中在如下层面:一是原因层面,有心理学角度的认知失调(G. A. 费思,2000),"不安"(巴萨德,2001),"群体极化"效应(桑斯坦,1992);二是后果层面,危害国家权力及社会秩序(汉斯姆·诺伊鲍尔,1990);三是对策层面,追踪源头(Pedro Pinto, 2012),识别信源(E. Seo, 2012),实时辨别(Jin, 2012),消解焦虑(Prash, 2005),价值认同(Sabine 和 Michael, 2008),倡导"摩西十诫"(薛恒,2013),遵守网络契约(梅因,2014),重视技术道德、树立情境主义伦理认识观(哈姆林克,2010)。

国外网络空间治理方式对网络安全研究极具启发价值,包括以美国、新加坡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王思界,2010),以日本为代表的行业协会主导型(李超民,2014),以法国为代表的社会公众主导型(谢新洲,2014)。

综上,目前国内外研究呈现出"三多三少"的现象:网络谣言单学科研究较多,而从叙事学、符号学等多维度研究相对不够,其中网络谣言的可辨性及其治理的可控性研究相对较少;网络谣言的原因、后果等方面阐述较多,而网络谣言治理的哲学反思论述不够,其中从哲学方法论层面进行学理分析及系统论证相对较少;网络谣言治理的宏观规制较多,而操作层面的系统性、针对性研究相对较少。对此,本研究将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化研究:① 围绕网络谣言的可辨性及其治理的系统性方面,从叙事学角度探析网络谣言叙事特点、治理体系构建等问题。② 围绕网络谣言治理的学理性及科学性方面,深入分析网络谣言叙事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的现实与逻辑关系。③ 围绕网络谣言治理的针对性方面,探索建立"跟进式"治理体系,对网络谣言叙事的危害范围、程度及方式,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实施精准治理。④ 围绕网络谣言治理的可控性方面,结合网络谣言叙事特征,构建一套集建设、防范、长效于一体的网络谣言"跟进式"治理体系。